



长江三角洲棉业外贸研究

(1912-1936)

于新娟 著

长江三角洲棉业外贸研究

(1912-1936)

于新娟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长江三角洲棉业外贸研究:1912~1936/于新娟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ISBN 978-7-208-09624-0

I. ①长... II. ①于... III. ①长江三角洲—棉花—对外贸易—经济史—研究—1912~1936 IV. ①F752.96
②F752.65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0598 号

责任编辑 周 峥 金绮寅
封面设计 陈 楠

长江三角洲棉业外贸研究(1912-1936)

于新娟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8.75 插页 2 字数 232,000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9624-0/F·2002

定价 32.00 元

序

李学昌

棉业对认识近代区域经济乃至中国经济至关重要,围绕这一领域的研究及其相关争论牵涉到诸多历史脉络和经济走势的宏观判断,早已超出手工业史和经济史的范围。本书对长江三角洲棉业外贸的研究,正是选择了这样一种“广角”视野,从长江三角洲棉业与外贸双向互动的因果关联,考察区域经济特有的内在动力,以及这些动力对外部市场的应对方式和应对能力。这种双向分析既要解释经济起伏如何影响到棉业的变化,又要说明棉业如何应对变动不居的外部环境,揭示出在与外部贸易互动中区域经济变化的历史意涵。本书处理这一难题的手法,是从棉业经济的国际市场、国内市场、区域市场到棉业经营诸内部环节做贯穿透视,在内部与外部相接的关键节点上考察棉业与外贸的交互影响,展示制度环境推动和制约棉业外贸等过程的复杂性。

本书关注到近代棉业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对区域经济和国际贸易都具影响的国家。在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中,有一种可称之为“国家-经济”关系的研究范式。这种范式通常致力于探讨国家给予经济的积极或消极影响。依照其中的政府寻租理论,由于政府收入分配制度的抑制和缺乏生产性财政政策的激励,再加上国家垄断的消极影响,明清时代手工业的发展步履维艰。^[1]相反,一些学者认为不能高估国家对经济的作用,强调国家所能掌握的影响经济的因素是微弱的。在明清两代,决定经济发展与否的主要是私营部门,政府对经济的积

极作用与消极作用同样微弱，^[2]与其说经济是受制于国家，还不如说是国家受制于经济。决定手工业是否发展的核心动力不是国家，而是市场。^[3]反观手工业，一些手工业行业固然可以置于国家-经济的框架中去分析，另一些则不可强调国家因素的作用。例如，本书重点探讨的分散于农家的手工棉纺织业很难说是一个国家垄断的行业，棉业与国家的关系并不像寻租政府理论所假设的那样简单。本书对棉业的研究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寻租政府理论对中国手工业与国家关系的假设，思考国家这一因素对经济近代转变的实际影响。有学者已经指出，近代早期欧洲经济的近代转向得益于国家之处颇多，中国经济长期不能开始近代质变过程，恰恰是因为国家对经济的影响微弱。尤其是到 20 世纪才开始这种近代转变的国家，经济更是需要国家的积极干预。^[4]本书中所展示的长江三角洲棉业状况，以及由此反映出的那个时代的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问题，一个重要的变数正是在于“过度市场化”，而不在于所谓的“寻租政府”。当然，本书没有运用这些“理论标签”，而是回归具体的历史进程，在棉业经济活动的微观层面，看到 20 世纪上半期国家的实际作用更接近传统经济“市场决定论”者所描绘的国家角色，虽然政府为了应对手工棉业问题在税收政策、棉产改进等方面实施了一些举措，但近代经济转变所需的降低交易成本、增进社会融合的“国家干预”，尚非国家在这一领域影响的主流。

本书虽以棉业外贸为研究对象，且对棉农、棉商以及棉布手工业者以市场为主轴的生产与经营行为浓墨重彩，详加描绘，但并未停留在市场为手工业及经济成长提供动力的层面。尽管市场可以使资源配置最优化，但市场并不能自动导致持久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相反，市场可能导致一种整体均衡，形成李嘉图式的“静止状态”。^[5]突破这种“静止状态”的出路当然不止一端，本书特别关注到了棉业生产与经营制度的变化，讨论了与棉业内部细密分工相适应的经营管理制度如何不断调整以适应市场变动，分析从棉花生产、资金筹措到产品批发分销等诸环节中，劳动力与资金充分利用以及节约成本的经营策

略。这样的研究将棉业的分析深入到了经营与管理制度的层次。作者或许没有明言,但书中的论证说明,与技术进步相比较而言,制度的完备以及与之相应的生产组织变化,是促使长江三角洲棉业发展的更加重要的因素。因此,判断近代手工业的性质变化未必要局限于技术标准,若以是否产生技术改进、技术发展达到何种水平衡量长江三角洲棉业,所见的只是停滞于黯淡的画面。但这样的结论与棉业外贸有起有伏的实际状况不符,或许循着多元因素分析的路径才可接近真实的历史过程。

本书所展示的市场、制度、国家、技术等多重因素交错的画面提醒我们,对20世纪前期区域工业发展的相关判断,仅仅局限于近代机器工业是不够的,手工业也应考虑在内。因此,对区域发展是否发生质性变化的宏观认识,亦不能斤斤计较于“近代因素”的成分。从20世纪长江三角洲棉业经济的视野中观察可知,所谓近代因素未必带来经济增长,而所谓传统因素未必导致“衰败”的结果。棉业的发展经验说明,直到本书所讨论的时代,传统因素的生产潜力仍可提供增长的空间。这使得长江三角洲棉业发展同时并存着多种路径,借用一些学者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可以称之为外延性增长、内涵性增长以及斯密式增长,^[6]即长江三角洲棉业发展是由不同增长模式的经济活动共同促成的,其间新旧混合、近代-传统杂糅,并非可以用单一的模式予以抽象或阐释。

承认达成经济增长因素的多元性并不是否定技术突破的关键作用,只是要强调技术并非充分条件,还有其他诸多因素制约经济增长。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可以使我们对经济成长有不同的认识。有学者注意到技术的“有效期”。这一观点可以用来解释长江三角洲棉业技术“停滞”,因为在特定的资金、劳动投入和市场需求条件下,棉业生产技术仍然“有效”,仍是效益最优化的技术。这就使得本书的讨论时期的棉业发展表现出外延性增长的一面,其动力主要来自于市场需求扩大和投资增加。

棉业所展示的多元发展路径并非孤例,类似的其他行业的起伏整体上显示出近代手工业变化的历程。长江三角洲虽然不曾经历西欧那样独立而持续的原始工业化阶段,但从手工业发展与工业化的关系来看,长江三角洲工业发展的道路未必像“特殊论”所强调的那样“特殊”。本书对棉业的研究证实,20世纪10—30年代手工业发展对其他部门如农业、工业、商业具有“正连锁效应”,“传统”的手工业技术可以和“发达”的近代工业相配合,手工业生产的增长并未滞后于长江三角洲欧洲经济发展的步伐,因此也不能认为它阻碍了近代化的进程。实际上,全球工业化进程中长江三角洲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的相互促动恰是正在经历的“工业革命”进程的组成部分。

本书由国际贸易与长江三角洲棉作农业、手工业及农家经济商业化过程的互动,暗示出商业化导致棉业的技术改进有限,其结果也不同于李嘉图式的静态平衡。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专业化与市场化发展的广泛趋势,农村经济结构、经营模式的合理化,以及在这些过程中形成的区域内部生产要素配置的市场机制,乃至部分环节的生产技术改进、生产效率提高以及收入水平的上升等由区域和国际贸易引发的变动,无法用任何一种“决定论”解释。正因如此,作者避免从单纯的市场因素或技术因素做出分析,而是兼顾这些侧面,从经营制度的角度着眼——在长江三角洲近代外贸的影响中,或许最具近代性色彩的正是制度变革。

注 释

- [1] Kent G. Deng, “A Critical Survey of Recent Research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53, No. 1 (Feb., 2000), pp. 1—28.
- [2] Albert Feuerwerker, “The State and the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ory and Society*, Vol. 13, No. 3, Special Issue on China (May, 1984),

pp. 297—326.

- [3] Kent G. Deng, “A Critical Survey of Recent Research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53, No. 1 (Feb. , 2000), pp. 1—28.
- [4] Albert Feuerwer ker, “The State and the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ory and Society*, Vol. 13, No. 3, Special Issue on China (May, 1984), pp. 297—326.
- [5] Kent G. Deng, “A Critical Survey of Recent Research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53, No. 1 (Feb. , 2000), pp. 1—28.
- [6] Albert Feuerwer ker, “The State and the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ory and Society*, Vol. 13, No. 3, Special Issue on China (May, 1984), pp. 297—326.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导言	1
第一节 主要概念的界定	1
一、“长江三角洲”的界定	1
二、“棉业”及“棉业外贸”的界定	5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7
一、棉业外贸的研究状况	7
二、棉业外贸研究亟待加强及实现途径	14
第三节 分析框架	17
第二章 棉业进口贸易态势	28
第一节 棉制品进口态势	28
一、棉制品进口种类	29
二、棉制品进口价值	31
三、棉制品进口数量	37
第二节 棉花进口态势	42
一、棉花进口数量和价值	42
二、棉花入超状况	55
第三节 棉业进口贸易的整体评估	59

一、棉业进口价值的数量分析	59
二、棉业进口贸易结构分析	68
三、棉业进口贸易与长江三角洲棉纺业	71
第三章 棉业进口对区域市场的冲击	82
第一节 洋商对棉业进口贸易的控制	82
一、洋商控制棉业进口贸易	82
二、日商的经营手段	93
第二节 进口棉业对市场的占据	99
一、日布占领棉制品市场	99
二、外棉畅销长江三角洲市场	104
第三节 传统棉业市场	114
一、土布业日趋衰微	114
二、土棉市场日益萎缩	133
第四章 长江三角洲市场的应对	149
第一节 政府的调控政策	149
一、政府的税收政策	150
二、政府的棉、布改进	154
三、政府调控的局限	162
第二节 行业协会的协调努力	164
一、呼吁政府推行兴棉、兴布政策	165
二、改进棉产	170
三、制定禁棉积弊条例	173
四、传授棉学知识	174
第三节 棉商布商的经营	176
一、棉商的经营	177
二、布商的经营	187

第四节 棉农织农的理性选择	203
一、棉农的选择	203
二、织农的选择	211
 第五章 结语	237
 附录	241
参考文献	260
后记	278

图表目录

表 2-1 1912—1936 年长江三角洲进口棉制品种类表 29

表 2-2 1912—1936 年长江三角洲进口棉制品种类结构表 30

表 2-3 1912—1936 年长江三角洲棉制品进口价值表 32

表 2-4 1868—1911 年长江三角洲棉制品进口价值表 33

表 2-5 1912—1936 年长江三角洲棉、绒及杂质匹货进口价值表 ... 34

表 2-6 长江三角洲棉制品类别占总进口价值的比重以及进口价值
指数表 36

表 2-7 1912—1936 年长江三角洲主要棉制品进口数量表 38

表 2-8 1912—1936 年长江三角洲棉花进口数量表 43

表 2-9 1919—1936 年江浙两省棉花产量和长江三角洲棉花进口
数量表 45

表 2-10 1894—1911 年长江三角洲棉花进口数量表 48

表 2-11 1930—1934 年纱厂用棉种别比重表 50

表 2-12 1912—1936 年长江三角洲进口棉花价值表 51

表 2-13 1912—1936 年长江三角洲棉花对外贸易出入超状况 ... 55

表 2-14 1919 年、1922 年、1933 年上海棉纺锭数量表 57

表 2-15 1912—1936 年长江三角洲棉业进口价值表 60

表 2-16 1912—1936 年中国棉业进口价值表 64

表 2-17 1912—1936 年长江三角洲棉业进口价值占全国的比重表
..... 67

表 2-18 长江三角洲棉制品、棉花进口价值占棉业进口总价值的

比重	69
表 2-19 江苏各县棉花原产地与外地消费比重及县外行销 区域表	73
表 2-20 1926 年 8 月—1927 年 7 月间各国每枚纱锭消费棉花 数量表	75
表 2-21 1924—1928 年华商纱厂历年月平均用花数量表	76
表 2-22 1924—1928 年华商纱厂历年用花比重表	77
图 2-1 1868—1936 年长江三角洲棉制品进口价值变化图	34
图 2-2 1912—1936 年长江三角洲棉制品进口价值分类变化图 ...	35
图 2-3 1912—1936 年长江三角洲主要棉制品进口数量变化 趋势图	40
图 2-4 1912—1936 年长江三角洲棉花进口数量图	43
图 2-5 1919—1936 年长江三角洲棉花生产数量与进口数量图 ...	46
图 2-6 长江三角洲棉花进口量与江浙两省棉花产量关系图	47
图 2-7 长江三角洲棉花进口与棉花产量关系图	47
图 2-8 1895—1936 年长江三角洲进口棉花数量变化图	49
图 2-9 1912—1936 年长江三角洲棉花进口价值变化图	52
图 2-10 1912—1936 年长江三角洲棉制品与棉花进口贸易关系 散点图	53
图 2-11 1912—1936 年长江三角洲棉制品与棉花进口回归直线图	54
图 2-12 1912—1936 年长江三角洲进口棉花、棉制品价值变化图	54
图 2-13 1920—1936 年长江三角洲棉花入超与汇率关系图	58
图 2-14 1912—1936 年长江三角洲棉业进口价值图	61
图 2-15 1868—1936 年长江三角洲棉业进口价值变化图	62
图 2-16 1912—1936 年中国棉业进口价值图	65
图 2-17 1912—1936 年长江三角洲与全国棉业进口价值关系图 ...	66
图 2-18 1912—1936 年长江三角洲棉业进口价值占全国的比重图	68

图 2-19	1912—1936 年长江三角洲棉业进口结构图	71
表 3-1	1912—1929 年间由日本输入中国的外棉数量、价值及 百分率	91
表 3-2	1924—1926 年美、日棉布价格表	95
表 3-3	中国输入各地棉织品百分比	100
表 3-4	中国各区输入日本棉布百分比	101
表 3-5	中国华中区输入日本棉布占该区棉布总输入百分比	102
表 3-6	1920—1926 年上海进口的东西洋棉布数量	103
表 3-7	1924—1929 年中国进口外棉情况	105
表 3-8	1919—1936 年江苏、浙江历年平均每亩皮棉收量统计表	112
表 3-9	1930—1934 年国内棉花供需状况	113
表 3-10	1912—1936 年长江三角洲土布输出数量	116
表 3-11	1912—1936 年中国土布输往海外市场的数量	117
表 3-12	1912—1936 年长江三角洲棉制品进口、土布出口价值 ...	119
表 3-13	1912—1936 年土布及十二磅本色细布价格升降表	123
表 3-14	1915—1918 年土布、棉纱、白米价格指数变动情况	124
表 3-15	1912—1936 年长江三角洲棉花出口数量和价值	134
图 3-1	棉制品进口流转环节示意图	87
图 3-2	纱厂购土棉交易图	108
图 3-3	1912—1936 年长江三角洲土布输出数量图	118
图 3-4	1912—1936 年长江三角洲棉花出口量变化图	135
表 4-1	上海商品检验局对长江三角洲 18 种棉花的分级检验之结果	160
表 4-2	长江三角洲主要产棉区花行数量情况	182
表 4-3	棉田面积所占当季耕地面积比例	205
表 4-4	余姚县九乡农民土地所有权状况	209
表 4-5	1914—1922 年上海重要物价统计	212
表 4-6	江苏各县主要副业分布情况	215
图 4-1	棉业机关组织系统	166

第一章 导 言

本书作为对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史研究的一部分,区域范围的界定必不可少。学术界尚未有关于长江三角洲区域范围的统一界定,因此开篇首先要对此作一交代。“棉业外贸”是本书考察的中心内容。棉业这一概念在民国时期的使用较为普遍,学者们在使用时没有统一的规范;对外贸易通常是指与海外的贸易,不过在中国旧海关的统计中,埠际贸易往往也称作是进出口贸易。因此书中也需要对“棉业外贸”作一界定。长江三角洲的棉业自明清以来就是支柱产业之一,近代开埠后长江三角洲又是中国对外经济联系最为密切的地带,棉业对外贸易非常活跃。学术界关于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研究成果丰硕,但是有关棉业对外贸易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本书将对棉业外贸研究的学术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并对研究框架作一分析。

第一节 主要概念的界定

一、“长江三角洲”的界定

近代开埠以来,长江三角洲是我国经济最为活跃也是我国最早进入近代化的地区。对于一项区域研究来说,只有对区域的概念、区域范围等问题作出了规范的界定,研究的科学性才会更高。而且要研究

长江三角洲的棉业对外贸易需要确定棉业进出口贸易的港口范围,因此首先要对长江三角洲的区域范围作一界定。

“长江三角洲”概念是伴随着近代地理学的发展、西方地学知识的广泛传播,各种音译三角洲概念的相继出现,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逐渐形成的。^[1]许多学者在使用“长江三角洲”概念时或者把它等同于“江南”或者认为是“江南”的一部分,而没有再作进一步辨析,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长江三角洲”概念在今天被普遍使用甚至使用频率高于“江南”的情况下,仍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以至于尽管有关长江三角洲的论著非常之多,但是,由于没有对概念本身作一界定,总是缺乏统一的规范。“江南”^[2]与“长江三角洲”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两者虽然都是一个地域概念,且关系极其密切,但“江南”更侧重于人文,古代文人墨客的作品中多有使用,而“长江三角洲”却含有更多经济的意味,是一个经济区域;其次,“江南”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而“长江三角洲”是近代地学发展的结果,是与传统中国走向近代社会相伴而生的,更具有时代的气息。在自然区域上,从字面看来,“江南”是指长江以南,它的区域范围许多学者都作了详细的阐述,尤其是李伯重对江南区域的界定^[3],已被史学界所广泛接受。而长江三角洲,从地貌上讲,系指长江水流挟带泥沙在入海口淤积而成的陆地,在学术界它还一直是一个没有确切界定的经济区域概念,但又是一个普遍使用的概念,说明人们心目中有一个大致的范围。

从历史上看,“长江三角洲”概念随着时代的变迁,内涵日趋丰富,从最初的单一自然地理概念逐渐演变为富含经济地理、社会经济区域多个层面。自然地理学上的长江三角洲区域范围,多数学者认为镇江、扬州以东区域属于长江三角洲。经济地理学上的长江三角洲在区域范围上往往比自然地理学上的长江三角洲平原要大,因为它涉及与这一地区相联系的一切经济活动,包括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4]近代开埠以后,以上海为龙头,由浙江和江苏一些城市所组成的位于长江

入海处的扇形冲积平原上的城市带,跻身于世界六大都市圈行列,长江三角洲区域成为中国经济版图上最大的闪光点。

在学术界,长江三角洲也是学者研究的热点,但对其区域范围的界定却存有歧异,尚未对概念本身做出规范。不过目前看来大致有这样几种观点:一部分学者把“长江三角洲”与“江南”等同,^[5]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基本是把长江三角洲处于从属江南的地位,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长江三角洲”概念是近代才出现的,而在古代这一地区统称作江南,学者在研究古代的江南时提到长江三角洲只能说明两者关系的密切以及学者对长江三角洲的关注,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长江三角洲”在今天已是不言自明的概念。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长江三角洲就是历史上以太湖为中心的三角地区,包括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地区。^[6]另有学者认为长江三角洲的范围要宽泛得多。^[7]海外汉学家在使用“长江三角洲”概念时也有界定。^[8]

对一个区域作出界定总要有一定的标准和原则。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冀朝鼎就提出古代基本经济区的概念,但冀朝鼎也承认这个基本经济区概念“对这一历史过程之后的情况就不适用了,因为以后的情况,由于中国开放世界贸易,及在 19 世纪中叶受到工业主义的影响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将基本经济区这一术语用于这种新的局面,那么,它的涵义就必须大大地加以引申,实际上也就是要重新下定义。”^[9]尽管如此,冀朝鼎提出古代基本经济区概念对我们仍有启发。施坚雅从研究历史上城市体系角度出发形成了他的经济区域理论,斯波义信在此基础上又加入生态系统作为考察的依据,使区域理论更全面。李伯重在《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所确定的划分古代经济区域的标准目前已基本被史学界所接受。不过,本书要对“长江三角洲”作一界定仍不能完全照搬现有的标准或模式,因为施氏的区域理论虽然经斯波义信的发展而日趋成熟,但是斯波义信的研究偏重于宋代,而李伯重是针对明清时期而划定,所以他们的理论和标准是否完全适合“长江三角洲”的界定值得研究。